



探尋家鄉的水文化

顧雅文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20 世紀末以來，在全球面臨氣候變遷與水危機威脅的背景之下，「水文化」一辭被重新概念化，各國紛紛將水文化的調查、保存與活化納入水資源政策的一環，但對其內涵的理解各有偏重。日本的水文化政策顯然較注重水與地域或社會生活的聯結，其經驗有助於我們思考如何探尋或建構屬於臺灣的水文化。本文認為，以小地域為範圍的深入調查或許更為當務之急，其內容至少必須涵括「水的控制」、「水與生活」、「水與生產」三大類，而在地居民的共同參與將是水文化得以發揮作用的關鍵。

水危機與水文化

1932 年夏天，來臺甫三年的 29 歲青年福田增太郎，以臺北帝大理農學部助教授及臺灣宗教研究者的身分，在土木水利的專業期刊《臺灣の水利》上連續發表了兩篇論文。他細數了民間的水信仰，並提醒推動現代化水利政策的工程單位注意，臺灣農民保守、固舊、消極受制於自然的心理往往與科學的、積極進取的技術精神相背^[1]。姑且不談其中是否隱含殖民者看待被殖民者的偏見，類似的言論在當時的各類報章雜誌上並不罕見。1930 年代初，東亞第一的嘉南大圳剛剛竣工，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即將完成，全臺二十餘條河川的治水計畫正在加緊編定，預計增加數千公頃新生土地的大型治水事業也在下淡水溪（今高屏溪）、宜蘭濁水溪（今蘭陽溪）如火如荼地展開。那是一個視臺灣水利事業「從順應自然走向對抗自然」的時代^[2]，事實上，以全球環境史的宏觀角度來看，控制自然水體可以提升國力與繁榮的信念在 20 世紀的大半時間都是主流^[3]。水利技術與工程師的成就被廣為傳頌，而與水有關的宗教、傳說、習俗或舊慣，若非被視為科技的對立，就是絕少受到水利界的關注。

與此同時，那些在多元的水環境中孕育出來的知識、經驗與價值觀也在逐漸消失，原因之一正是水利工

程的快速進展。對常年與水互動的地方居民來說，水體的豐枯、緩急、清濁、淺深，形塑了其認識水、利用水、治理水的方式。但在 20 世紀（尤其是下半葉）追求水資源效益最大化的治理典範下，水在時間與空間的不均衡或質與量的不穩定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水利工程技術越成功地克服了問題，也就意味著地域的獨特性與相應的文化多樣性變得越來越模糊。

然而，日益嚴峻的氣候變遷與全球水危機的威脅，促成 20 世紀末以來水利工程界的典範轉移，人定勝天的思維受到挑戰，水利專家重新以永續發展的概念看待人與自然。隨之，與水相關的傳統文化也被重新評價，帶著彌賽亞的光環進入水利人的視野之中。世界水理事會（WWC）2003 年於京都舉行的第三屆世界水論壇中首次將「水與文化」列入探討議題，並指出水危機的解決方法必須結合地方文化、傳統知識與現代科技及管理方法^[4]。2006 年，聯合國世界水資源日（World Water Day）的主題正是「水與文化」，教科文組織（UNESCO）總幹事松浦晃一郎在第四屆水論壇中再次重申了上述主張。幾個聯合國推動的研究組織支持並強化了水利界與文史界的對話，如國際水歷史學會（IWHA）及其每兩年舉辦的大會提供了全球水歷史與教育的跨領域交流平臺^[5]；教科文組織國際水文

計畫 (UNESCO-IHP) 認為文化多樣性對環境的永續發展至關重要，其設立的「水與文化多樣性」研究項目，亦召集了各領域專家，考察水在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中的意義與價值、根植於文化的實作與技術、主導水管理及利用的規範或不成文慣例、以及不均衡的權力關係下的水衝突與解決案例^[6]。水利界與文化界共同關心水議題的其中一個具體產物，是由國際灌溉排水委員會 (ICID)、水理事會發起，受到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 (ICOMOS)、教科文組織等單位響應的「世界水文化資產系統 (WSH)」認證，於 2016 年正式展開運作，旨在登錄並保存以人為中心、運作百年以上的水管理系統，作為水的無形文化資產，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收集古老智慧、提取創新思想、並轉化為可以適用於現今時空脈絡下的知識^[7]。

伴隨「水文化」重新被概念化的國際趨勢，許多國家也陸續將此一關鍵字納入水政策的一環。以東亞為例，日本歷經 1960 ~ 1970 年代間的水資源大規模開發時期，國土廳 (現國土交通省) 水資源部於 1999 年 6 月提出了 2010 ~ 2015 年間的中長程規畫，此一「新全國總合水資源計畫」(ウォータープラン 21, WP21) 中指出，氣候變遷可能影響水資源的穩定供應，開發新的水資源又不符高齡化、少子化的社會經濟現況，因而必須在資源有限的認知下確立健全的水循環系統，其中一個關鍵手段便是「水文化的回復與育成」。WP21 為水文化下的定義是「人與水的關係」，包括治水、利水及生活三個層面。治水是為了減少水的威脅而治理水，所有與水相關的設施都是為了防災 — 堤防、水制毋需解釋，水圳、埤塘、水庫或水道閘門的築造亦是為了減低水的時空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災害；利水是指為了營生而積極利用水，如以河川作為交通、運輸手段或引水發展農業、製造業；而生活面泛指飲食、洗浴、洗濯等日常運用，以及傳說、信仰、觀光等精神上與水的關係。藉由地方居民共同找尋、再生或創造地域水文化，希冀能重建人與水的緊密關係，提高流域上下游的共同體意識，以構築永續活用水的社會^[8]。另一方面，中國學者提出構成水文化的四個層面要素：觀念層面包括人們對於水的認識、理解、崇拜以及通過宗教、文學、藝術等方式表達出來的對水的感悟；制度層面諸如人們利用水、管

理水、治理水的社會規範、社會習俗、法律法規；行為層面指人們對待水、利用水的行為模式；物質文化層面則是人類在使用水、治理水、美化水環境過程中形成的物質建設結果，尤其是有文化象徵意義及內涵的運河、水渠、水井、橋樑、水壩、水景觀等設施^[9]。2011 年，水利部頒定了「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 (2011 ~ 2020)」，2016 年又為落實綱要而頒布「水文化建設 2016 ~ 2018 行動計畫」，在此強力的施政方針下，短短數年間，講述中國水文化的叢書、文章及相關的博物館便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臺灣，以水文化為名的政策於近幾年萌芽的契機與世界水文化資產系統認證有關。2014 年起，文化部、水利署均推動了水文化資產調查的相關計畫，並以座談會方式號召政府機構、民間組織與專家學者投入，試圖挖掘及建構臺灣獨特的水文化。

他山之石 —

日本的水文化調查、研究與應用

由上述政策動向可知，水文化在解決水危機上的正面作用被廣泛承認，其定義也大同小異。然而，從實際的推動過程來看，各國對水文化內涵的理解卻各有偏重。在中國從事水文化研究與應用的大多為水利專家，公眾參與較為缺乏^[10]，水文化建設的重心置於調查及保護弘揚民族精神的水利工程遺產之上^[11]。臺灣的水文化資產政策儘管有水利與文化部門的共同支持，但偏向以開發、技術的角度進行普查及訪談，因而盤點出的水文化也多為水利設施本身所體現的智慧^[12]。相較之下，日本的水文化調查顯然較注重水與地域、水與社會生活的聯結，其所謂「人與水的關係」所指涉的「人」亦非「民族」、「人們」或「人類」這般抽象的整體，而是指長年居住在水邊的每一個常民個體。

WP21 公布之後，國土廳水資源部隨即於該年 11 月針對被指定為「特定農山村地域」等的二千餘個地方自治體發出問卷，調查該市、町、村中是否存在或曾經存在水文化、水文化正在衰退或消滅的主因、以及是否進行水文化保存再生活動，其中有 451 個自治體回報了 600 件以上的水文化記錄。根據分析，約有 35% 的地區認為該地的水文化正在衰退，但半數以上正由公所或居民進行保存與再生的活動^[13]。為了進一

步促發各地的動能，國土廳又邀集官、產、學專家組成水文化檢討委員會，於翌年擬定了《透過水文化保存與再生以活化水源地區之方針》^[14]。

從內容可知，這本小冊子的預設讀者是有志於以水文化振興地方的公所職員或在地居民，因而提供了保存再生的詳細建議步驟（如圖1）及調查票範本，其中，步驟(1)至(4)的調查方式頗值得參考：要之，挖掘一地的水文化，先應考察當地的水資源或水環境，如雨量多少，在流域中的位置如何，水在哪裏被取用，又流往何處，以「地域水循環圖」來表現；其次，水文化的種類繁多（詳下節），包含有形、無形、有名、無名等各種形式，透過文獻、耆老訪談或田野實察，便能尋找出當地存在或曾經存在的水文化，登記於「水資源及水文化臺帳」中，將其種類、所在位置、歷史及現況、管理人等時空資訊都記錄下來；臺帳僅是靜態的記述，但水環境及各種用水方式可能隨著四季變化，因而還需調查因水的季節變化而出現的各種地方行事，如特有植物開花、農作成熟、候鳥飛來、昆蟲出現、祭典活動等，製作「水的歲時記」；除了一年間的變化，還有長時期的變化，而「水與水文化年表」則最能顯示水環境何時被改造、傳統水文化何時消退、或以其他方式再生。

如此的調查設計，建立在對水文化三個層次的理解之上。首先，水文化是地方居民與水體互動時經過長期而反覆的錯誤嘗試及取捨選擇而釀成，它由地域社會內部產出，反映著當地當時的價值觀，與地域居

民共有的生活、生產樣式相伴，並且為地域內部所繼承。第二，水文化必須在實際地域社會中發揮機能才有價值，若只是保護、收藏起來，甚至與日常生活隔絕，就失去調查及保存再生的意義。最後，水文化不能僅由政府或專家指定，在地人共同參與調查與挖掘的過程，是產生地域認同的過程，更是重建人水關係的關鍵。

1980、1990年代的一些著名案例或許提供了此一方針的思想根源。香川分水舊慣的活用就是一個常被提及的例子。四國的香川縣是少雨地區，在17、18世紀新田開墾之際積極築造埤塘，數百年來農村間亦發展出嚴格的「番水制度」。依據地方耆老所述，埤塘受益地帶通常被分為數個小區，由管理埤塘的「池守」定出順序後輪流配水。各區皆設有管理分水的「水配」，其下則有「田子」協助。池守訂出埤塘放水的時間範圍，時間一到出水口便關閉，因而水配必須在此時限內讓各區水田依序分得灌溉水，責任十分重大。遇到旱年則配水時間變短，轉換成「走水灌溉」的形式（即水田不灌滿水，只澆灌至保持土壤濕潤的程度）。特別的是，香川地區的田地灌溉水量持分可以買賣，取得較多持分的地主，每單位土地所能獲得的水量就多，每塊土地的水量持分都記載於土地臺帳中，以線香長度的形式表現。分水宛如一場氣氛緊張的儀式，缺席者視同放棄灌溉，因而所有農民皆聚集在側。水配帶著裝在「配水箱」中的線香，依據臺帳記載及箱內刻度製作出相應長度，當埤塘出水口一開，水位高漲到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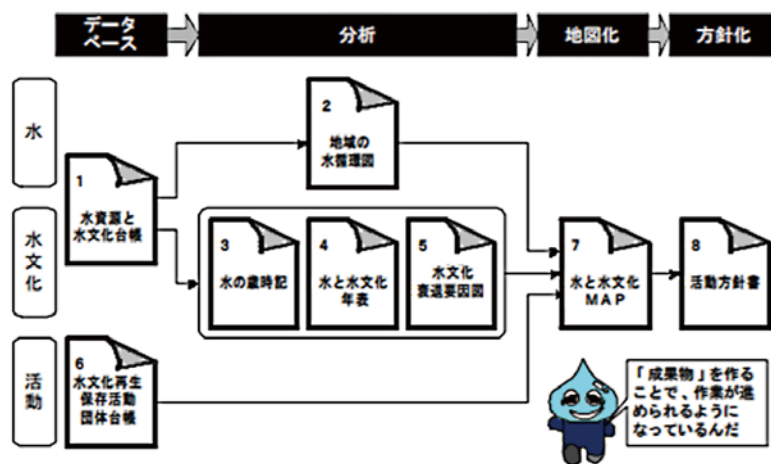


圖1 水文化檢討委員會建議的水文化作業階段與八份調查成果表單

資料來源：日本の水文化，第129頁。

延著堰板進入田地的瞬間，便打響梆子，將線香點燃。線香燃盡後，以太鼓為信號，將堰板抽起，水便沿著圳路往下一塊田地流去。此一水資源管理舊慣隨著水源的穩定而逐漸消逝，尤其，「香川用水」事業於 1978 年完工後，水源得以從吉野川上游築造的水庫經貫通山脈的隧道導引至香川縣內，供給農業、工業及民生所用，農民則以繳付建設費換得取水權利，將水儲存於埤塘中。1994 年，日本發生 20 世紀最嚴重的旱災「平六渴水」，為了維持都市居民用水的最低限度，當局不得不與農村的水利組合商量，要求讓出農業用水支援都市。此時農村也已陷入緊急狀態，埤塘的儲水量急遽降低，農民除了實施挖井、裝設幫浦及抽水管線設備等應急措施外，在水利組合的勸說下很快接受了老一輩人都熟知的分水舊慣，只是線香改成時鐘，梆子及太鼓換成旗子，秩序井然地實行了嚴格的配水管理，節餘的水量全撥給都市居民，順利渡過了旱災。換言之，並非農業用水供過於求而能挪用至民生用水，而是缺水區長年孕育出的分水文化解救了都市災情^[15]，這些常民智慧也讓在地居民在面對災害時具有比都市更低的脆弱性。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水文化案例在九州的有明海沿岸。佐賀平原與筑後平原在中世以前就有人為拓墾，是日本史上有名的濕地開墾（干拓）地帶。開墾時必須挖溝促進排水，減緩洪災，並將挖出的土堆高，作為宅地、田地或堤防的基礎，故地表上有著縱橫交錯的水渠（クリーク）。當地乍看是水源極為豐富的地區，實際上河川多缺乏充分集水面積而流量不足，最大的筑後川又因平緩及位於低處而難以取水，無法潤澤越來越寬廣的開拓地，因而，在排水之外，這些水渠也同時具有引入河水及貯存雨水的功能。水渠中設置了大小水門，以上下游合意形成的秩序決定開閉時機^[16]。為了緩解用水不足，農村地帶另外發展出獨特的「アオ（淡水）取水」方式。此因筑後川河口一帶的潮位差距可達 5~6 公尺，堪稱日本之最。漲潮時，比重較小的淡水浮在海水之上，沿河逆流而上約達 25 公里，也提高了河川水位。每月僅有兩次的大潮時分是沿岸居民取水的最佳時機，輪值者打開連結河川與水渠的樋管與閘門，駐守在側觀察灌入潮水之顏色、泡沫形狀、聲音、味道，一旦發覺海水混入即將閘門關閉，由此取得的淡水便儲存在水渠中。由於水路比農地還低，以龍骨踏車將水送入田中，是該地農村舊時常見的田園景色。此外，因地下水鹽分過高，當地居民並不打井，而是趁每日漲潮時汲取潮峰

中沒有鹽分的河水，或過濾水渠中的水加以飲用。正如香川的番水制一樣，此一奠基於在地知識與經驗的取水舊慣，在上游大壩等設施陸續完工後逐漸沒落，但可以取得淡水的地點以及利用潮水的時機成為代代相傳的知識，於旱災時同樣發揮了功效^[17]。

除了農村之外，筑後平原的柳川是與水共生的城市。17 世紀築成的渠道交織其中，不僅具有農村水渠的機能，還有著城市的特殊性。渠道分布、架橋與水門閘板的設計更具調節水位與水勢的精巧機制，既要防止大雨時突然漲水，也要維持一定水量作為運輸水路，還要保持一定的流動，以供給岸邊人家的民生用水。城中居民有一套維持水質潔淨的慣習：清晨時分通常為汲水之時，渠水經過一夜的沈澱最為乾淨；其餘用水在家家戶戶汲水後才能進行；較髒的物品只能在別處洗濯，髒水並不直接排入水渠，而是挖洞倒入其中；岸邊種植水芋等有助於淨化水域的植物；便溺絕對禁止，污染渠水也要受罰；此外，每年的「水落し」時節，城民會將渠水排空，共同疏浚及清掃渠道，讓渠底經陽光曝曬殺菌，水中植物及微生物也能獲得更多氧氣，增加淨化能力，而此期間捕獲的魚，就成為居民一整年的蛋白質來源。論者指出，該地居民在此嚴苛的水環境下養成的價值觀並非對水的敵視，而是與水友好的思想。在此生長或到此旅遊的騷人墨客，也為水清影翠、人水共生的地景留下多筆詠嘆之作^[18]。然而，在戰後高度經濟成長期間，柳川市建立了上水道系統，許多水渠成為垃圾棄置場，或是被私自加蓋後在其上建造倉庫或工廠，惡臭的水溝出現大量蚊蟲，極度影響了環境衛生。1977 年，市議會終於宣告水渠的死刑，決議掩蓋或填埋幹線以外的中小型渠道。當時任職環境課都市下水道科長的廣松傳，憑著自身的專家知識與鄉土情懷，說服市長將掩埋計畫延後，並不斷招開與地方居民的墾談會，呼籲市民疏浚水路、停止排污，共同參與水渠淨化計畫。廣松成功喚起了柳川市民對水的美好記憶與對傳統水文化的自豪，柳川也守住了水鄉的美譽。時至今日，柳川市的水渠只剩下遊船的觀光價值，與新一代在地人的日常生活不再深切相關，水質的維持又漸漸變得困難。當地的市民團體「水の会」正在試圖找出住民與水渠的新關係，創造符合新時代的水文化^[19]。

與此相較，靜岡縣三島市源兵衛川的水文化仍舊發揮著機能。源兵衛川也是一條人工水渠，全長 1.5 公

里，流貫富士山腳下的三島市中心。其水源來自自富士山的湧泉，在 15 世紀末 16 世紀初由三島地方豪族寺尾源兵衛為灌溉所建，流經地帶被稱為中鄉。為了將讓冰冷的湧泉加溫，上游挖掘的渠道又淺又寬，水路延著湧泉蜿蜒，且為了防止雨季時泥水流入而設在高處，因而無需太多維修，管理也很方便，故歷經四個世紀至今仍在用，不僅是中鄉地區稻作的穩定水源，也成為沿岸居民飲用及洗濯的用水來源。17 ~ 19 世紀的江戶時代，地方農家時有爭水，終在 19 世紀後半由中鄉地區 13 個農村的農民共同成立組合，並由水配人加以分水管理。戰後此一水利組合更名為「中鄉用水土地改良區」，繼續負責源兵衛川的維護及營運。然而，1960 年代起，上游持續工業化，因抽取地下水而導致湧泉水量劇減，加上都市化造成垃圾、廢水不斷倒入河水，水質更為惡化，川邊逐漸被視為兒童禁止進入的危險地帶。1985 年時，水利組合甚至考慮將其以水泥覆蓋而改建停車場。1990 年初，在靜岡縣政府服務的渡邊豐博，因為長年擔任農業基礎建設的相關公務，體認出英國的 Groundwork 概念在解決地域環境問題上的有效性。他將這個結合公民、行政力量與企業組織共同合作的方式稱為日本的「平成道普請」，並於 1992 年成立「Groundwork 三島實行委員會」，將原本互不往來甚至互相對立的水利組合、各類市民團體及在地企業串連起來，進行源兵衛川的再造^[20]。Groundwork 三島擔任仲介與溝通的角色，經過 3 年內近 200 次的說明會，說服了市民自主加入清理環境的行

列並裝設污水處理系統，遊說了企業回饋社區及捐款，也得到公部門的行政協助，終於將源兵衛川打造為親水公園，水邊再次出現消失已久的梅花藻、螢火蟲與戲水孩童，該地亦成為觀光景點及實施環境教育的場域^[21]。2018 年，全世界有三處水文化系統資產得到國際認證，此一運行四百餘年的互助水管理系統就是其中之一。

探尋臺灣的水文化

日本的經驗有助於我們思考如何探尋或建構屬於臺灣的水文化。整體而言，臺灣與日本的水文化有許多共通或互相影響之處，但臺灣的地質地形更為複雜，族群更為多樣，各地形成的水文化也更加多元；加上短期間歷經多次政權更迭，還有快速的都市化與工業化，水文化消失或變化的速度恐怕更加急遽，因而以小地域為範圍的深入調查或許更為當務之急。綜合日本水文化育成方針的建議，以及有關水歷史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臺灣的水文化調查至少必須涵括以下幾個種類（如表 1 所示）。

與水的互動最直觀地表現在對水的控制上。臺灣的河川大多坡陡流急，亂脈橫生、河道變動的現象也經常發生。清代以來許多地區都有農民合力築造土堤、石堤的記錄，但堤防多已不存，或在日治時期成為新式堤防的一部分。日人引進聖牛水制、粗朶沈床等水防工法，烏溪曾被稱為臺灣防洪構造物的試驗場。築堤治水的需要養成了技術工人砌石、編裝蛇籠等技藝，過去以大安

表 1 臺灣水文化的種類及調查項目

| 人與水的關係 | | 調查對象 | 調查項目舉例 |
|---------------|------|-------------------------|-------------------------------|
| 水的控制 (緊張) | 防止水害 | 構造物築造的時空背景 | 河堤、水制、護岸、閘門、防波堤、堰、壩的歷史 |
| | | 工法、技藝的演進 | 砌石工法、編裝蛇籠工法、竹籠厝、穿鑿屋建築結構與材料 |
| | | 制度的運作 | 水防制度、扛厝走溪流 |
| | | 組織的運行 | 水害組合 |
| | 利用資源 | 構造物築造的時空背景 | 水圳、埤塘、井、抽水幫浦、水車、堰、壩、上下水道的歷史 |
| | | 工法、技藝的演進 | 鑿埤、石筍工法、鑿井技術 |
| | | 制度的運作 | 埤圳制度、番水(水香)、輪灌制、爭水調解舊慣、盜水罰則 |
| | | 組織的運行 | 水利組合、水利會、水公司 |
| 水利人物 | 人物 | 技術者的內心世界、技術者間的社會網絡、譜系傳承 | |
| 水與生活 (依存) | 維生 | 飲用水源 | 濾水方法、保持水源潔淨的慣例 |
| | 清潔 | 洗浴或洗衣文化 | 沐浴、泡澡的習慣、洗衣場的演進 |
| | 冷卻 | 消防用水 | 城市消防設備的演進 |
| | 娛樂 | 戲水方式 | 捉魚、游泳、玩水的地點或集體記憶 |
| | 精神生活 | 文學或美學作品 | 以水為對象的歌謠、文學作品、畫作、老照片、諺語、傳說、故事 |
| | 信仰 | 宗教 | 水神、水鬼信仰、水圳或堤防的祭拜儀式 |
| 水與生產 (工具性) | 栽培 | 農業 | 豐水或枯水區的特殊農產 |
| | 養殖 | 漁業 | 水產養殖的發展 |
| | 食用 | 食品業 | 水質甘美地區的茶、米粉、豆腐等特產 |
| | 洗滌雜質 | 工業 | 造紙、染織業的發展 |
| | 輸送 | 運輸業 | 渡筏、運送木材、船運的歷史 |
| | 加壓 | 電力事業 | 水力發電的情況 |

溪及濁水溪沿岸的兩個流派最為有名^[22]。築造埤塘或水圳是清代農業移民來臺開墾的必備技能，至今仍為農村的命脈，有的全面水泥化，有的仍維持舊有風貌。如在屏東萬丹，大陂圳的翻埤、拆埤曾是年年的地方盛事，村民於當地李隆宮擲筊決定翻埤工事的日期，共同將埤堤缺口堵起，以截斷東港溪水。翻埤難度很高，成功則水位提高，能將河水引入崁頂、東港一帶灌溉。二期稻收作成後，要於雨季來臨前再將埤拆除，以防河水暴漲吞沒兩岸田莊^[23]。

水太多、水太少都引起地域社會間的對立—左岸築堤可能造成右岸淹水，上游引水可能導致下游缺水，此一緊張關係促成各地自主形成水的共同體，以合意的秩序與慣例維持水利設施的百年不墜。如清代臺灣也有與香川縣番水制類似的「水香」，上下游「燃香按寸、輪流灌溉」是公正分水的機制之一，維修管理埤圳、堤防的互助組織則成為今日水利會的前身。嘉義太保水牛厝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戰後初期政府治理水資源效力不彰之時，自治的水圳文化竟成了居民脫貧的關鍵。因該地地勢較高，長年乏水灌田，在地人士想出「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共同出資設立了水利公司，裝設幫浦設法偷接溪水，其維持管理的運作方式與昔時的水利共同體如出一轍，提高的農作收成徹底改善了水牛厝的經濟情況^[24]。另合作也有其他形式，在河道變化不定、水患頻仍的濁水溪、曾文溪、八掌溪、隘寮溪等流域，都能採集到村民合力扛著竹籠厝走避大水侵襲的舊慣。

對水的控制有所貢獻的人物也可以是調查對象。然而，調查人物歷史並非是要塑造一個突破困境建立偉大工程的水利英雄，再次陷入人定勝天的窠臼，而是要重構技術者的內心世界，探索他們在地域風土及時代思潮中形塑的自然觀或人生觀，以及其技術的傳承譜系。

其次，與水的依存關係造就了生活層面的水文化。水井在地表水源不足及地下水源豐沛的地區十分常見，如雲林口湖水井村村民曾以鑿井技術聞名全臺。公井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建設，村民每日去井邊挑水、洗衣、洗菜，同時也交換資訊，維繫鄉里情感^[25]。鹽分地帶的臺南安南無法利用井水，居民便挖掘水塘收集雨水及淺層地下水^[26]；埤圳自然也是生活用水來源，苗栗公館的

「食水圳」就是因為供給石墘村人飲用而得名。使用地表水的關鍵在於維持水質清潔，如對安南當地人來說，養殖或洗濯用的水塘稱為水堀，飲用的稱為食水堀，有著嚴格區別；若是飲用、洗濯物品甚至牛隻泡水降溫都在同一條圳，使用時間及順序就必須尊重當地的不成文規定，太髒的衣物或農具則要清理後才能拿到水圳清洗。據日治時期日人異文化視角的觀察，煮沸飲用是臺人特有的傳統習慣，另因挑水勞務繁重，臺人在家中有極度節約水的風氣，身體只擦拭不浸浴，但勤於在外洗衣^[27]。高雄美濃的客家聚落，至今還留著在圳溝邊洗衣的習俗。帶著弄髒圳水的抱歉心情，有些婦女會在過年後首次洗衣時對著水圳禁香祭拜。有趣的是，不同於閩南人面向水源的洗衣方式，美濃人站在水中面對著岸邊洗衣，反映出客家婦女浣衣還必須防衛四周敵人來襲的艱辛開拓史^[28]。

玩水的童年記憶與抒發情懷的美學作品常常是最觸動人心的水文化。在易淹水的河畔可以採集到代代相傳的俗諺或傳說，層累的地方知識藉此而保留下來，提醒後代災害可能發生的時機、地點或徵兆。如蘭陽平原有著「龜山戴帽」的諺語，意味龜山島上若烏雲籠罩就預示著洪水即將來臨^[29]。而諸如六堆客家莊祭拜的水伯公、雲林湖口的牽水（車藏）、八堡圳的圳頭祭、蘭陽溪沿岸的拜駁、濁水溪沿岸的祭溪王等等各地祭拜水神、水鬼、圳頭、堤防的儀式，反映的是在地先民對水的敬畏或感謝。

最後，水量的豐沛、增加或水質的優良可能造就一地的特殊物產或產業，也是另一種層面的水文化。如新武呂溪帶著豐富有機質與礦物質的水，孕育出著名的池上米。大漢溪水質清澈甘甜，帶動大溪豆干、三峽米粉的食品製造業，沿岸的樹林、板橋曾是有名的釀酒地，過去溪裏也能捉到香魚^[30]。雲林大埤興安村位於虎尾溪畔，昔日如大龍擺尾的河道幾乎年年導致洪水，但洪水帶來的有機肥讓種植芥菜的土壤持續補充肥力，反而成為生產酸菜的最大宗產地^[31]。

結語

近年來，在社區大學等公民團體及地方政府的努力下，諸如雲林溪掀蓋、五溝水守護、瓦礫溝再造、鹿港溪回復等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雖然非以水文

化為名，進行的正是地域水文化的挖掘、保存與創造工作。由此來看，水文化的調查過程或許比結果更為重要，在地居民的參與可能是水文化得以發揮作用的關鍵。

然而，追尋刻印在地域中的水文化並非只是消解懷舊鄉愁，也不是僅僅讓水利工程增添具有文藝氣息的景觀設計。我們不大可能直接移植歷史上控制水的工法或技術，但藉由剝開被現代工程包覆的地景中一層層的歷史紋理，才能理解過去這塊土地上的人在什麼樣的價值觀下做出何種嘗試及選擇，那些思維又在何種自然環境及社經背景下得以成立或變得不可行，進而能擷取其中因著經驗累積而來的在地知識，在充分的自覺下思考一個更柔軟、更能與當地調和的水治理與利用方式。我們不需再合力築堤造圳、扛起房子走避大水，或依靠祈求鬼神保佑水源豐足、水患停止，但必須記起的是此處人水之間曾經存在的緊張關係，警戒著有水可用或無災無患並非永遠理所當然，進而體會水文化中蘊藏的互助、合作精神及與水共存的智慧。我們或許很難回復飲用圳水、河邊洗衣那般的生活樣態，但水文化的建構過程將時時提醒我們對家鄉水體的認同意識，以及過去在生活、生產層面上與水緊密的依存關係。就此點而言，探尋一地水的歷史與文化已然不是也不能再是學術象牙塔中的工作而已了。

參考文獻

1. 福田增太郎，「水をめぐる本島人の信仰（上）（下）— 農民心理の一考察—」，臺灣の水利，第2卷，第4、5期，第20-26、73-79頁（1932）。
2. 木原圓次（總督府內務局土木局事務官、臺灣水利協會副會長）於1933年所言。木原圓次，「年頭所感」，臺灣の水利，第3卷，第1期，第1-2頁（1933）。
3. McNeill, J. R. 著，李芬芳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的世界環境史，書林，臺北，第165-207頁（2012）。
4. “Analysis of the 3rd World Water Forum,” World Water Council, Marseille, France, pp. 25, 31 (2003).
5. 顧雅文，「水文化與水歷史的交會」，水資源管理會刊，第19卷，第1期，第23-29頁（2017）。
6. Johnston, Barbara Rose, Hiwasaki, Lisa, Klaver, Irene J., Ramos Castillo, Ameyali, Strang, Veronica, Water, cultural diversi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merging trends, sustainable futures? UNESCO and Springer SBM, Jakarta, Indonesia, pp. xi-xx (2012).
7. “World Water System Heritage Programme,” http://www.icid.org/wsh_criteria%20n_nomination.pdf.
8. 國土廳編，「新しい全国総合水資源計画（ウォータープラン21）」，<http://www.mlit.go.jp/common/001020428.pdf>。
9. 鄭曉雲，水文化與水歷史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第6頁（2015）。
10. 鄭曉雲，水文化與水歷史探索，第8-13頁。
11. 鄧俊、呂娟、王英華，「水文化研究與水文化建設發展綜述」，中國水利，2016年第21期，第52-54頁（2016）。
12. 財團法人臺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臺灣水文化資產體系調查與價值評估計畫成果報告書」，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報告，臺中（2018）。
13. 三和總合研究所編，日本の水文化，ミネルヴァ書房，京都，第74頁（2001）。
14. 国土庁長官官房水資源部，「地域を映す水文化、水が導く地域の未来：水文化の保存再生を通じた水源地域の活性化方策」，<http://www.mlit.go.jp/tochimizushigen/mizsei/mizusato/files/bunka.html>。
15. 富山和子，「水の文化とは何か 第1回：ため池文化融通の智慧」，水の文化，第1號，第7-18頁（1999.1）。
16. 宮地米蔵，「海と川と土をつなぐクリーク：佐賀平野を養う水利用」，水の文化，第32號，第34-39頁（2009.7）。
17. 富山和子，「水の文化とは何か 第3回：有明海とアオ（淡水）の世界」，水の文化，第3號，第15-28頁（1999.10）。
18. 大崎正治，水と人間の共生 — その思想と生活空間，財團法人農山漁村文化協會，東京，第183-215頁（1997）。
19. 水の文化編集部，「水の会の18年の歩み 堀の記憶が成し遂げた柳川再生物語」，水の文化，第32號，第40-45頁（2009.7）。
20. 渡辺豊博，「グラウンドワークを活用した各地域での取り組み」，農業土木学会誌，第67卷，第6號，第617-622頁（1999）。普請為傳統社會進行公共建設的常見方式，指地域住民合力提供資金或勞力修築道路或堤防。
21. 彭滄雯，「公共管理者在社區營造的推手角色：日本源兵衛川再生經驗的啟發」，社區發展季刊，第140號，第291-299頁（2012.12）。
22. 顧雅文，測繪河流 — 近代化下臺灣河川調查與治理規劃圖籍，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臺中，第144、163頁（2017）。
23. 蕭銘祥主編，屏東縣鄉土史料，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第391頁（1996）。
24. 謝宜疆訪問，葉煌實口述歷史記錄，未刊稿（2018.11.15）。
25. 若雨，「人工鑿井」，豐年，第57卷，第22期，第63-64頁（2007.11）。
26. 翁育民，「臺南市安南區食水堀之形成與變遷」，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臺南（2006）。
2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衛生調書第11輯（實地調の三）生活篇（本島人），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臺北，第127-131頁（1932）。
28. 鍾鳳娣，「美濃水圳文化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高雄（2009）。
29. 陳偉智，「作大水的宜蘭史：天然災害、現代性與日常生活」，蘭陽溪生命史：「宜蘭研究」第五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縣史館，宜蘭，第491-524頁（2004）。
3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校編，臺北縣鄉土史料，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第192、312頁（1996）。
3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校編，雲林縣鄉土史料，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南投，第176頁（1996）。